

劇本與劇本之外—— 美麗島事件之構陷脈絡

陳佳宏

摘 要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爭議不斷，充滿國民黨當局入人於罪的構陷痕跡，從1979年底美麗島高雄衝突事件始，延燒至隔年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一連串政治事件（統稱：美麗島事件）亦然；與其他眾多政治案件之構陷脈絡相較，美麗島事件同樣有其事先編排好的叛亂劇本與公式化的叛亂情節，特別之處在於多了一些引導輿情的戲劇化鋪陳與伏筆，以及當局敢於全程公開展示構陷成果。依照當局習性，承襲（抄襲）長年構陷劇本墮美麗島人士於深淵自是順理成章，採取慣用的暗箱操作亦具可能性；然而，美麗島事件引發之海內外關注目光實屬空前，多位當事人又頗具國際知名度，動見觀瞻，所以當局欲循前例、大搞政治黑箱的做法已不符現實局勢。因此，若囿於內外壓力而必須將事件全貌攤在陽光下以昭公信，那麼，如何透過「劇本」沿用，將事件發展導引至有利於當局的政治風向，讓美麗島人士依照劇本走向而公開俯首認罪（錯）、受罰，以及如何因應瞬變情勢，適時調整「劇本之外」的應變作為，藉此反擊國內外質疑聲浪而能持續鞏固統治威信，乃成為當局布局構陷脈絡之考量關鍵。

關鍵詞：美麗島事件、美麗島大逮捕、美麗島偵訊、美麗島軍法大審、林宅血案

Script and Beyond the Script: The Framed Connections in the *Formosa* Incident

Fupian Chen^{*}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political cases in Taiwan that were filled with controvers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White Terror. Oftentimes suspects were framed by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and the *Formosa* Incident of 1979 was no excep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political cases, the similarity was that there was a “script” of rebellion with a formulaic plot written by the authorities beforehand. What made the Incident special was that there were greater efforts made by the authorities to set the stage and guide public opinion,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bold enough to publicly display the results of the frame-up.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practice, it was most common for the authorities to follow the “script” and adopt a secret method. However, the *Formosa* Incident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persons involved were internationally well-known, so it became very difficult for the authorities to conduct a so-called “black box” operation. Due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essures, the government found it necessary to expose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Incident under the sun in order to gain credibility. In such a situation, how to follow the “script”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and accomplish the political objectives of the authorities, making the suspects publicly confess their alleged “crimes” and be punished, became key considerations. Adjusting to a fluid situation, fac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doubts about the case, the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make contingency plans and constantly modifying the “script” so as to protect its reputation and consolidate its power.

Keywords: *Formosa* Incident, *Formosa* Arrest, *Formosa* Interrogation, *Formosa* Military Trial, Lin Family Murder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劇本與劇本之外—— 美麗島事件之構陷脈絡*

陳佳宏**

壹、前言

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爭議不斷，充滿國民黨當局入人於罪的構陷痕跡，但鮮有加害者會自承在對受害者施行構陷、濫行懲罰，反而會產生一套符合加害者自認具正當性的思維理路，¹ 因此，即使「構陷」被廣泛認知為國民黨當局對政治案件的處置方式，在語詞用字上貌似詭詐無理，若細究其中的「構陷脈絡」，也未必不能察其規律；基本要素上，大致包含如何羅織的法制基礎、偵辦準則、審判程序等，² 以及案件當下所有可能的網絡連結而成，為當局可以完全主導的既定模式，而大部分政治受難者通常也只能被動地承受這般構陷，默默配合地走上這條荊棘之道。如此不對稱的權力壓迫關係，雙方的角色扮演與終局似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銘謝。本文為110年度科技部計畫「劇本與劇本之外：國民黨政府對美麗島事件之掌控與失控」（110-2410-H-003-004-）之成果，2022年12月11日初稿曾發表於「解讀檔案·書寫歷史——國史館2022年學術討論會」。

收稿日期：2003年2月8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5月3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¹ 壓迫者或反改革方之自以為義的論述可見；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吳介民譯，《反動的修辭》（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² 常見的戰後政治案件處置模式可見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年）。

乎被命定著，儼然如同上演一齣精心設計的戲劇，³ 擔任編導的當局，手握千篇一律的生殺「劇本」，直要受難者們照著其中的構陷脈絡配合演出，讓當局得以自我說服係在「替天行道」，以及壓服局外的民眾去站在當局「正確」的那一邊。

從1979年底美麗島高雄衝突事件始，延燒至隔年春美麗島軍法大審之一連串政治事件〔按：統稱美麗島事件〕亦然；依照國民黨當局習性，承襲（抄襲）長年構陷劇本墮美麗島人士於深淵自是順理成章，採取慣用的暗箱操作亦為可能；然而，美麗島事件引發之海內外關注目光實屬空前，多位當事人又頗具國際知名度，動見觀瞻，尤其是來自美國行政⁴ 與立法部門⁵ 的嚴重關切、強烈要求「公開審判」更為關鍵；所以當局欲圖前例、大搞政治黑箱的做法已不符現實局勢。因此，若囿於內外壓力而必須將事件全貌攤在陽光下以昭公信，那麼，如何透過「劇本」沿用，將事件發展導引至有利於當局的政治風向，讓美麗島人士依照劇本走向而公開俯首認罪（錯）、受罰，以及如何因應瞬變情勢，適時調整「劇本之外」的應變作為，藉此反擊國內外質疑聲浪而能持續鞏固統治威信，乃成為當局布局構陷脈落之考量關鍵。

美麗島事件至今已逾40年，相關的研究環境與條件愈趨成熟，⁶ 承繼之前筆

³ 美麗島事件受難者之一的楊青矗便認為該事件：「是政治事件、非法律事件，要辦要抓任其所欲。判決受難的罪證完全是自編自導的劇本，一律是硬拗的假證據。」楊青矗口述原著，陳世宏訪問編註，《楊青矗與美麗島事件》（臺北：國史館，2007年），序頁8。

⁴ 美國在臺協會主席丁大衛（David Dean）向華府臺灣人保證，美國必會要求國民黨當局採取公開審判，且不會有死刑；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大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234-235、239。

⁵ 1980年3月5日甘迺迪參議員（Edward Moore Kennedy）在國會針對美麗島事件之發言：「我最先的盼望是那些和高雄事件有關的被捕人士能獲釋或受最輕的處分。如今結果既然不是這樣，那麼最要緊的是被告們能在他們自己選擇的律師的諮商下，在公開的刑事法庭裏得到及時而公正的審判……」〈美國國會紀錄（Congressional Record）126期第35號〉，王康陸譯，〈甘乃迪關於美麗島事件的聲明〉，收入王康陸文教基金會編，《王康陸博士紀念文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頁361。

⁶ 相關美麗島研究之介紹與討論可見陳佳宏，〈美麗島偵訊期間之「叛亂」建構——以軍法被告為中心〉，收入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執行編輯，《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1年），頁18-19。

者的美麗島系列研究，包括從事件初起的時代背景、事件發生後的大逮捕輿情狂潮、⁷ 偵訊期間當局對美麗島方之「叛亂」建構、⁸ 隔年二二八林宅血案悲劇後的輿情翻騰、⁹ 軍法大審之際黨國統治結構與被告方之間的權力對立關係，¹⁰ 以及法庭上諸般民主化和臺灣主體性理念之發揚等課題，¹¹ 本文希能總結這些過往研究面向，捕捉美麗島事件的歷史本質與弦外之音，補上美麗島篇章的另一塊拼圖。

貳、鋪陳與伏筆

1978年底美國與臺灣的中華民國終止正式外交關係，在總統緊急命令權之啟動下，當年底的選舉活動被無限期推遲，使黨外政治空間頓時阻塞；這股無處宣洩的政治能量，導致1979年開年以來朝野對立情勢不斷升溫，8月美麗島雜誌社創刊後之黨外聲勢迅速高漲；根據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一書提到，蔣經國在9月下旬便預判「最近一、二月之內以情勢而論，似有大事發生，處理事變應以周詳嚴密沈著為要。」¹²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高雄衝突事件發生，比蔣之預期晚了些時日，但相較於對年初橋頭事件至6月許信良停職等事項之「忍耐」，蔣一改年來「周詳嚴密沈著」之應對，下令「將全部禍首拘捕，暫作處理。」3天內即將美麗島人士「一網打盡之

⁷ 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勢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91-230。

⁸ 陳佳宏，〈美麗島偵訊期間之「叛亂」建構——以軍法被告為中心〉，收入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執行編輯，《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15-50。

⁹ 陳佳宏，〈「美麗島林宅血案」之輿論情勢——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2018年12月），頁99-144。

¹⁰ 陳佳宏，〈從「美麗島軍法大審」看國民黨當局對黨外力量的壓制〉，《二十一世紀》，總第177期（2020年2月），頁100-122。

¹¹ 陳佳宏，〈美麗島事件與臺獨〉，《臺灣風物》，第54卷第2期（2004年6月），頁139-163。

¹² 〈蔣經國日記〉，1979年9月23日，收入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頁117-119。

後，再做斬草除根之事……」¹³，其決策與動作不可謂不果斷迅速。

然而，蔣經國處理美麗島人士的公文決策，目前僅見對事件終末軍審「覆判」駁回之「如擬」核示，¹⁴在重大決策上皆未著筆墨痕跡，¹⁵益顯欲蓋彌彰，¹⁶相較其父蔣介石總統動輒直接干預政治案件裁判結果的張揚，形成極大的反差。因此可以理解，為避免落人口實而把事件處置與蔣經國個人決斷連上關係，當局乃透過各地區警備機關協調地方黨、政、民意、社團，發動「支持政府，揭發彼等陰謀事實」的輿論，¹⁷企圖形成聲討美麗島人士的風潮，循序漸進、製造高潮，最後順勢而為，鋪陳「眾人皆曰可殺」的輿情聲浪，合理化蔣之拍板懲治決策的正當性，並可淡化、遺忘蔣的獨斷身影而成全其隱身幕後的心思。觀察這些針對美麗島人士的各式煽情言論、激情演出，以及種種戲劇化橋段，似已埋下一些伏筆，揭示及印證當局後續之處置與順應「民意」變局的端倪。

其實早在美麗島事件前，南區警備司令常持琇便授意黑道、流氓和國民黨極右翼人士打著「愛國」大旗對美麗島人士進行暴力攻擊，¹⁸且從1979年初延續不斷至11月底，惟主流平面媒體竟以〈社論〉肯定涉入團體「疾風」之「愛國」動機為「純真無私的情操」，¹⁹只要願意付出法律代價就可肆意妄為？彷彿在頌揚

¹³ 〈蔣經國日記〉，1979年12月18-22日，收入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120。

¹⁴ 「國防部發文呈蔣經國總統為覆判黃信介等人所擬判決請核示」，收入林本原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六）軍法審判》（臺北：國史館、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頁865。

¹⁵ 比較接近總統府層級的公文決策，目前可見1980年2月1日由國安會秘書長沈昌煥所下對於偵訊筆錄的指示：「『一二一〇專案』一週來（元月廿四日至卅一日）偵訊內容綜合要點簽核」，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臺北：國史館、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頁235。

¹⁶ 明明逮捕令是由蔣所親自下達，蔣亦親自主導事件後的處置事宜（當然包括構陷脈絡），但在目前看到的檔案資料中卻無蔣親自簽署下令指導的文件，若說有一兩件留存尚可評估蔣之介入程度，但毫無筆墨痕跡，豈非欲蓋彌彰？

¹⁷ 「治安組執行對『一二一〇（安和）專案』檢討報告」，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43-444。

¹⁸ 「李博愛致趙必忠調查高雄事件期間戴崇慶之舉動情節請參考處理」，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46-249。

¹⁹ 社論：「這次疾風雜誌社所表達的立場，頗不失為率直而光明磊落的。因為縱然行為人的這一

水滸梁山泊之忠君報國教條，為著「大義」則暴行小惡皆可忽略，反之，只要是被認為「不愛國者」，即使被構陷、被暴力私刑對待亦是正義之舉。這種「愛國無罪、愛國有理」的價值觀²⁰ 透過媒體複製與放大，不惟助長社會暴戾氣息、加劇衝突，亦如同在先行為隔年春的「林宅血案」悲劇譜上序曲。²¹

高雄衝突事件當日白天，蔣經國以國民黨主席身分於刻正召開的四中全會上痛斥臺獨為賣國賊，指稱其「不自覺的受了共匪分化顛覆的陰謀所利用，必須加以清除。」²² 其實，蔣雖在9月已預判「大事」不日即將發生，但應無法料準當晚即是引爆點；蔣之事件前發言係直接針對臺獨與中共，重述打擊三合一敵人（黨外——美麗島人士與臺獨、共匪之勾結）的構陷八股，固然了無新意，不過，在衝突事件後，終可使陳年政治宣傳下的虛擬危機落實為當下、眼前威脅，也再次確立以鋪陳「臺獨、中共」因素作為對美麗島人士連串構陷的論述基調。

國民黨當局檯面上對事件的初步反應，是為12月11日警總常持琇凌晨之聲明，遺憾美麗島人士的非理性行為，希望社會大眾共體時艱，不要製造內部混亂，以免給敵人可乘之機；²³ 行政院則由內政部總務司長至高雄慰問受傷的軍憲警。²⁴ 從治安首長表面態度之低調，以及行政院僅由層級不高的事務官員出面，加上11日當晚電視新聞對事件之報導亦不著重²⁵ 來看，一方面自然是當局決策的時間差，畢竟人員調動（例如大逮捕籌辦）等處置細節仍需規劃與分配任務，另

行動是出之於愛國的動機，但不合法的行為仍是不被法律所允許的。故如行為人坦然而承認所作所為，接受法律的責任，則更足以顯示其純真無私的情操。」；〈任何人都應遵循法律的理性的軌道——論黃信介住宅被搗毀事件〉，《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2日，版2。

²⁰ 可與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家Samuel Johnson所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作為對照。

²¹ 被常持授意「制裁」美麗島人士的戴崇慶，後也被當局列入林宅血案的涉嫌者而遭到境管。「國安局第三處第三科據特三組情報為戴崇慶被列為安和專案對象向各界陳情簽請核示」，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50-251。

²² 〈蔣主席在四中全會致詞全文〉，《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1日，版3。

²³ 〈南區警備司令今晨表示 時值冬防不准集會遊行 美麗島及疾風社申請皆未獲准 黃信介說不遊行卻未遵守承諾〉，《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1日，版3。

²⁴ 〈孫院長關懷受傷憲警 特囑內政部轉致慰問〉，《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²⁵ 艾琳達之觀察；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頁154。

外更顯重要的，即是等待（發動）各界上下一致、全民同心、支持政府的輿論聲勢形成，²⁶可讓當局對美麗島人士之整肅更加師出有名。

相對於行政部門初始的低調表象，12月11日黨部四中全會上的反應則是一片撻伐之聲，主張依法制裁或應予嚴辦；²⁷各縣市首長與各地方縣市議會的立場不脫「依法制裁」、「以維安定」²⁸的兩段式論證。這些領頭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矛頭固然指向美麗島人士為破壞安定的淵藪，但大致上仍能謹守法治界線；「依法」（雖然係惡法）——也是當局後續處置的原則，反倒是同時間輿情所呈現之特定的大專校園師生，例如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法商學院、中山醫學院、中國市政專校等，在撻伐美麗島人士上顯得較為激動，充斥八股情緒用語；²⁹在情勢未明的初始便有此激情表態，殊不知真是青年學子熱血使然，或是當局長期慣用的校園策動手法（製造學子由下而上的校園「民意」）奏效。

在傳統印刷媒體當道的年代，展現社會大眾「民意」最有力的的平臺，自是以各大報社的讀者投書或民意論壇為主，12月11日一天之內，主流平面媒體接獲各地讀者電話、投書之反應速度、數量和強度上皆屬歷年罕見，³⁰反應者包括教師、中南半島回國難胞、高雄事件現場目擊者、公務員、軍人、農民、護士、工人、商人

²⁶ 警備總部政六處聯繫新聞單位負責人及記者，保安處治安組下設專案新聞組「協調地方黨、政、民意、社團，發動輿論，支持政府，揭發彼等陰謀事實，形成民眾要求懲辦暴行之聲勢」；「政六處對『一二一〇（安和）專案』新聞處理情形檢討報告」，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35；「治安組執行對『一二一〇（安和）專案』檢討報告」，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43-444。

²⁷ 〈破壞團結製造不安行徑 應依法律嚴加制裁 不得再予寬縱姑息 全會人士譴責暴力事件〉，《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2。

²⁸ 諸如「應即依法懲處，以安定社會，而振人心」、「應採取斷然措施，依法懲治滋事份子，以維護復興基地的安寧與安定。」請參見〈治安人員忍辱負重 各界慰問致敬 嚴正譴責暴力行為要求依法懲兇〉，《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²⁹ 諸如「全國青年團結，維護國家的法治與秩序」、「嚴懲不法暴徒，以振綱紀」、「全國知識青年團結愛國，凝結成一股消滅邪惡，伸張正義的大力量」請參見〈大專青年同聲憤慨呼籲守法維護秩序〉，《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治安人員忍辱負重 各界慰問致敬 嚴正譴責暴力行為 要求依法懲兇〉，《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³⁰ 〈憤怒、痛心、遺憾、憂懼 讀者對暴力事件感到無法忍耐〉，《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不要暴亂〉，《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及學生等社會各階層人士；³¹「民意」指控美麗島人士與共產黨陰謀連結，³²或是將美麗島的罪名海外臺獨連結，³³甚至是黨外成員也看不慣同志的作為，³⁴營造美麗島人士眾叛親離的分裂形勢，暗示反對派陣營「窩裡反」的可能性。

為強化敵我分明、同仇敵愾的情勢，從12月12日開始，媒體遂大量傳播各醫院軍憲警的受傷畫面，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前往慰問的消息；其中，有別於大部分官員慰問受傷人員的行禮如儀，高雄市長王玉雲的「慰問」就特具戲劇效果，他不僅在11日凌晨兩度（1點去，4點回家，7點又來）到醫院探視遭到毆傷的軍憲警，而且還當場痛哭流涕，與這些傷者哭在一塊。³⁵13日另有一則受傷保警陳孝榮的報導，據稱他被以鐵鉤勾落10顆牙齒，嘴部、下額部受傷，不能進食也不能言語。因此，只能用筆並流著淚在紙上寫下：「你給我錢有何用？我要國家存在。〔按：這兩句話，報紙特別掃描在版面上〕憲警人員不還手，暴徒們還要打，倒地後還要打，不但正面打，側面也打，簡直沒有人性，希望政府不要再縱容沒有人性，居心叵測的陰謀份子。」³⁶這些具感染性和穿透力的情節與畫面，可輕易引來同情，³⁷加深民眾相信「暴行」確實存在，而加害者自然直接指向美

³¹ 〈大家談 所謂民主人士 居然訴諸暴力 姑息足以貽患 寬容應有極限〉，《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2。

³² 「不能叫這些少數人利用大陸共匪、越共顛覆政府的語言、口號和暴行來破壞。」請參見〈憤怒、痛心、遺憾、憂懼 讀者對暴力事件感到無法忍耐〉，《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³³ 「自從前年中壠事件發生以來，野心份子日形囂張，勾結海外臺獨組織，顛覆我復興基地，企圖在臺灣煽動暴亂，置一千七百萬同胞於死地。」請參見〈憤怒、痛心、遺憾、憂懼 讀者對暴力事件感到無法忍耐〉，《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³⁴ 「一個身體魁梧的邱姓黨外人士先是救了被圍毆而沒有還手的保警……邱某說，美麗島雜誌社的這種行為，超過了民主國度裡應有的規範。」請參見〈正直的高雄市民 毅然的主持公道 親見憲警 一再挨打 挺身而出 救護傷患〉，《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³⁵ 〈各界人士慰問受傷憲警 有人贈金有人輸血 王玉雲在醫院傷心落淚〉，《中國時報》，1979年12月12日，版3；〈各方慰受傷憲警 王玉雲痛哭流涕〉，《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³⁶ 〈扛碎牙齒和血吞！受傷保警極悲憤 給我錢有何用？我要國家存在 孔令晟慰問憲警人員 轉達蔣總統關懷至意 陳孝榮傷重不能言語 用筆寫出他沉痛心聲〉，《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3日，版3。

³⁷ 軍憲警人員受傷畫面的傳播，使得醫院湧現探慰的民眾，直接影響到傷患之休養時間。所

麗島人士；受傷者愈慘烈，則美麗島人士愈顯兇暴且危險，當局肅清暴徒的時效愈加迫切。

類似陳孝榮的受傷人數多寡，關乎炒作事件的嚴重程度與否；所回報的數字從「幾十位」、「16位」、「許多人」，到最後拍板的183人，³⁸ 其間盤算之演變與數字、情節的不合理性，³⁹ 並不會削弱美麗島人士「惡行」的強度。甚且，還加料流傳著美麗島人士「罪行」之所以能夠得逞，係因治安人員被下令「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所導致。⁴⁰ 究其實，現場的鎮暴行動尚包含施放催淚瓦斯，如此強烈的反制措施竟可被引導成「打不還手」，將國家暴力的劊子手搬演為釘上十字架上的殉道者，而被鎮壓的美麗島人士反成為手執長矛的羅馬士兵，去刺穿軍憲警的胸腹；實情整個被扭曲的程度有多誇張，民氣沸騰的聲浪就有多洶湧，將美麗島人士送上刑臺的情緒就有多理直氣壯。

電子媒體的激情傳播上亦不遑多讓；12月12日晚間政治評論員丁中江在新聞節目中聲稱要效法「吳鳳精神」，⁴¹ 感化美麗島人士這些「民族的敗類，國家的叛徒」，⁴² 並當場向觀眾宣告：「我就要捨身取義，我要求他們不可打治安人員，要打就打我，要殺就殺我，要燒就燒我，我絕不抵抗，我願意犧牲生命，我

以有關單位便開始實施管制，呼籲熱心探視的人士，以不打攪受傷的憲警為原則，不妨簽名致意即可，請參見〈各方捐款慰受傷憲警 憲兵司令部極表感謝 決將慰勞品轉贈慈善機關 慰問金捐作自強愛國基金〉，《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3日，版3。

³⁸ 12月11日，憲兵指揮官薄玉山說是幾十位負傷，同日常持琇本說16位，後改口「許多人」，最終數字是由警政署長孔令晟確定為183人，請參見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勢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1期（2007年3月），頁200-201。

³⁹ 呂秀蓮，《重審美麗島》（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頁215-218。

⁴⁰ 〈法治國家絕不容許暴行！警備總司令表示 黃信介未履行不遊行承諾 美麗島又圖集會治安機關已依法拒絕核准 高市警察局證實展開調查肇事者姓名身分〉，《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⁴¹ 丁中江的「吳鳳精神」係感化「沒有讀過書、不識字的山胞」等觀念，充斥傳統國民黨黨國教育對原住民的刻板偏見與歧視，請參見丁中江，〈痛斥美麗島暴行：在臺視「新聞評論」講稿〉，收入高陽生，《美麗島事件》（臺北：駿馬文化事業社，1979年），頁186。

⁴² 丁中江，〈痛斥美麗島暴行：在臺視「新聞評論」講稿〉，收入高陽生，《美麗島事件》，頁186。

相信我的生命可以喚醒他們的良知。」⁴³ 節目末了還用訣別式的口吻：「面對我們全國的觀眾，我要說出我心中的悲憤，謝謝收看，我不敢說下星期還能跟各位再見，謝謝！」⁴⁴ 以一種極富戲劇張力的方式，將吳鳳殉身神話與治安人員的謠傳英勇事蹟相結合，不惜再次消費、詆毀原住民，也要藉此投射美麗島人士兇殘、野蠻、未開化的「他者」本質；而「我方」（國民黨當局 + 民眾）才是代表文明，站在正義的一方。

這類「捨身取義、殺身成仁」之革命烈士、殉道者的形象，⁴⁵ 構成國民黨黨國知識體系中的重要價值環節，透過制式教育之潛移默化或樣板戲劇演出，形塑許多臺灣大眾成長過程裡的共同記憶與共通語言，此際再經過傳媒的加工渲染，不難因此產生共鳴；平面媒體便直接反應民眾此刻的激情：聯合報「大家談」專欄從12月11日接獲五十多封投書，到12月12日投書量暴增到數百封，投書者包括社會各階層人士；⁴⁶ 《中國時報》12月12日一日內收到的投書共達381件，電話四百餘通，尚不包括各地分社，⁴⁷ 可見民情之沸騰；其中一則署名3位基隆市民的投書，引證美麗島人士之行為構成《刑法》第五條及第一百條「普通內亂罪」，並籲請昭示國人：「憲兵是軍人，攻擊軍人者視同敵人處以死刑。」⁴⁸ 如此殺氣騰騰的投書，篇末還附上3位投書人真實姓名及地址，顯示願為其主張負責任的態度；其中「叛亂罪」藉由投書揭槩輿論平臺是為初登場，竟與之後當局懲治美麗島人士的論罪主軸不謀而合；惟一般民眾可能僅意識到能以「普通法」

⁴³ 丁中江，〈痛斥美麗島暴行：在臺視「新聞評論」講稿〉，收入高陽生，《美麗島事件》，頁185-186。

⁴⁴ 丁中江，〈痛斥美麗島暴行：在臺視「新聞評論」講稿〉，收入高陽生，《美麗島事件》，頁187-188。

⁴⁵ 不惟吳鳳神話，近代史尚包括黃花崗72烈士、林覺民與妻訣別、太原五百完人等，古代史則有文天祥正氣歌、張巡、許遠死守睢陽城等等不一而足。

⁴⁶ 〈大家談 所謂民主人士居然訴諸暴力 姑息足以貽患寬容應有極限〉，《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2；〈大家談 暴亂行動不容姑息 應當依法懲處 政治人物應有良知 豈可自誤誤國〉，《聯合報》，臺北，1979年12月13日，版2。

⁴⁷ 〈憤怒、痛心、遺憾、憂懼 讀者對暴力事件感到無法忍耐〉，《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2日，版3。

⁴⁸ 〈毆辱憲兵警察該當何罪 敬請政府招告國人糾眾滋事公然破壞法紀讀者一致認為不能寬容〉，《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3日，版3。

懲罰美麗島人士，就算是達到制裁「敵人」的目的，殊不知更為嚴峻、株連更無孔不入的《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特別法，才是當局日後應對美麗島叛亂的利器。

綜上，從長期積累之濫用愛國主義與掩護暴力、打壓異己的輿論氛圍，延續至高雄衝突事件爆發後，使國民黨當局更有藉口以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為名，催化民眾恐懼感而轉換為對美麗島人士的仇很值，並將事件導引至「共匪」、「臺獨」等海外力量之陰謀策劃，在短短數日內利用散布假訊息與編造虛偽的戲劇化橋段，煽情炒作，妖魔化、分化反對陣營，曲解、操作「民意」，令社會各階層趨向非理性；用簡單的二元對立方式，將美麗島人士形塑成凶殘、野蠻、邪惡的「他者」——「反派角色」，而我方（民眾「被站在」當局這一陣線）則自居為正義文明的使者化身，當然可以執叛亂重典手刃美麗島人士。這些情節鋪陳，環環相扣，對照每一步的發展，就好比在回應前述情節遺留的伏筆，好像早就安排好之精心布局的劇本，似乎無論局勢如何演變，都可囊括在當局的構陷脈絡中。

叁、「公式」⁴⁹ 運行與程式錯誤

《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係白色恐怖政治犯最易遭受構陷的法條且互為表裡，前者動輒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包括習稱「二條一」唯一死刑之惡名昭彰，後者則明確界定「匪諜」是：「指懲治叛亂條例所稱之叛徒，或與叛徒通謀勾結之人」，⁵⁰ 等於可在法律上以叛亂罪將所有反政府之言行都判定為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於是，即便是與中共在臺灣地位議題上處於南轅北轍的臺獨主義者（黨外獨派與海外臺獨），在這套法律架構的邏輯下都可輕易被構陷為匪諜。所以，在國民黨當局大肆整肅美麗島人士時，既有過往的構陷經驗（叛亂 = 共匪 + 臺獨）可資借鏡，又有當下、被炒作下之擁護政府、清剿美麗島的「民氣」可用，在構陷開局上便占了先機，甚至可在一千人等

⁴⁹ 本文以「公式」界定「叛亂 = 共匪 + 臺獨」，係指不可挑戰的結論，如同公式般恆定。

⁵⁰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2條。

還未全部逮捕前，便先行安排處置方式與罪名、罪行安插。1979年12月20日當局擬定〈「一二一〇」專案偵訊工作指導綱要〉⁵¹ 指引各個特務、警政機關之偵辦方向；基本上不出前述簡便的「叛亂公式」連結，即是「共匪」和「臺獨」的雙核心運行——後者受前者的操縱與支持，兩者實為一體、互為表裡，皆企圖滲透島內、顛覆當局；⁵² 和前述蔣經國在四中全會的宣示吻合，如同基本公式（叛亂 = 共匪 + 臺獨）般繼續套用在美麗島人士身上。

叛亂基本公式架構下所擬定的偵訊準則和執行要點等，係為指引事件各個發展階段的構陷脈絡——劇本大綱，因此，遂成為偵訊人員向美麗島人士取得供詞時，依照劇本所要求獲得的「答案」，並據以製作調查筆錄、自白書等；根據公式運行常軌，必不會產生任何偏離此公式的資訊，倘若有美麗島人士不願配合，意圖表露劇本之外的資訊，則自然有人會讓他們「被自白」，調整成公式運行下的劇本。⁵³ 依據美麗島8名軍法被告的調查筆錄可公式化當局對其的構陷脈絡統整如表1：

表1、構陷脈絡公式表

公 式	導 源	動機、目的	行 動	外 力
叛亂 = 共匪 + 臺獨	內：雷震、彭明敏、郭雨新 外：臺美斷交	奪權 顛覆政府 建立新國家	臺獨暴力 高雄衝突	海外臺獨 中共

以「共匪」加上「臺獨」等於美麗島叛亂公式的不變結論外，此叛亂的內部導源，係受歷來國民黨當局所迫害之指標性人物的影響，包括1950年代雷震等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1960年代彭明敏等本地臺灣人菁英，以及1970年代中因選舉爭

⁵¹ 「『一二一〇』專案偵訊工作指導綱要」，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111-115。

⁵²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年），頁93-96。

⁵³ 軍法被告之一的呂秀蓮表示，美麗島偵訊時的自白書，根本是「他白書」，內容是別人寫的，要求她照簽。〈評李明哲案 呂秀蓮：自白內容待驗證〉，收錄於「自由電子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81051>（2023/06/20點閱）。

議而赴美國發展的黨外先驅郭雨新；其中，雷震⁵⁴和彭明敏⁵⁵本就是當局登錄在案的叛亂犯，彭明敏更和郭雨新先後「叛逃」至海外與臺獨合流，所以，當這些「叛亂前輩」皆程度不一地影響美麗島人士時，無疑可傳承其叛亂DNA且不驗自明。

外部導源上，國民黨當局直接將臺美斷交後的自身統治危機，轉化為美麗島人士的臺獨叛亂動機，⁵⁶謂其藉機利用外交困局以蠱惑人心，⁵⁷集結在美麗島雜誌社從事奪權謀劃，⁵⁸並在黃信介的指定下，由許信良、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施明德等「五人小組」執行奪權目標，⁵⁹擬定短程、長程奪取政權、推翻政府的計畫，最終目的在「引發全面性之暴亂，一舉將政府顛覆」⁶⁰，「而後在全面掌權後，變更國旗、國號、國歌建立成另一個國家」。⁶¹

⁵⁴ 1960年10月雷震被以「知匪不報」、「為匪宣傳」兩項罪行判刑10年定讞；〈雷震等三人分處徒刑之判決主文及判決要旨〉，收入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冊（臺北：桂冠出版公司，1990年），頁441-445。

⁵⁵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判決書」（1965年4月15日），〈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案〉，《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4/1571/007。

⁵⁶ 例如林義雄供述：「中美斷交後，我對臺灣必須成為一個國家的傾向越強。」請參見「林義雄調查筆錄」（1980年1月22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或呂秀蓮因臺美斷交後的選舉停選而主張臺獨，請參見「呂秀蓮調查筆錄」（1980年1月23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⁵⁷ 例如黃信介供述：「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部分的民眾對政府未來的前途產生茫然感，對臺灣的現狀能否永遠保存下去，有了懷疑，我發覺這種不安心理，正可大加利用……」請參見「黃信介調查筆錄」（1980年1月24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⁵⁸ 例如施明德供述：「繼於六十八年間，共同籌辦美麗島雜誌，並參與該雜誌社工作，以為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鋪路。」請參見「施明德調查筆錄」（1980年1月29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或黃信介供述：「假雜誌社之名，貫徹我們反政府人士之主張，達到推翻政府奪取政權，使臺灣獨立之執行機構。」請參見「黃信介調查筆錄」（1980年1月24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⁵⁹ 「黃信介調查筆錄」（1980年1月24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⁶⁰ 「黃信介調查筆錄」（1980年1月24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⁶¹ 「姚嘉文調查筆錄」（1980年1月22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叛亂行動展現上，則是從1979年元月下旬「橋頭遊行事件」所衍生之一系列黨外與國民黨當局的對抗，美麗島人士被目為將採取「以力對力，以暴對暴」的臺獨暴力叛亂路線；⁶² 具體叛亂行動之高峰，便展現在1979年12月10日的高雄衝突事件中；⁶³ 前述被誇張渲染化之軍憲警受傷情節，可資證明叛亂確有其事。然而，當日叛亂暴動工具主要是棍棒、磚頭、石塊，在全副武裝的鎮暴部隊面前實在遜色，但透過事後鋪陳之戲劇化橋段，意圖說服民眾這就是一場武裝叛亂。

為加強叛亂的說服力道，國民黨當局遂從叛亂公式運行裡析出兩項「外力因素：海外臺獨、中共」作為輔證；其中前項，因陳菊與郭雨新密切的主僕關係，隨著郭之在美而聯繫未斷下，令陳成為傳遞海外臺獨訊息與人流的橋梁，所以不僅蔣經國視她為眼中釘，⁶⁴ 「陳菊 + 海外臺獨」也是公式——外力因素的溝通參數；其次，在連結中共部分，原先的草案——「匪諜劇本」編排有數端：「結合洪誌良、陳永善〔按：陳映真〕及『摘峯二號』等顯著之匪諜案件，擴大偵究，增強本案之說服力」，⁶⁵ 然而，在當局刻意區別黨外統獨和族群分野的微妙心態下，不欲造就外省人和本地臺灣人合作、共同反抗國民黨的印象，⁶⁶ 竟捨棄絕佳

⁶² 例如林義雄供述：「對政府要有實際的『暴力』行為，口號、遊行已不能顯示我們的力量……俟聲勢壯大後，伺機製造暴亂，推翻了政府，『臺獨』自可成功。」請參見「林義雄調查筆錄」（1980年1月22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或呂秀蓮供述：「必要時我亦贊成用非和平方式，利用暴力、武裝的手段，顛覆政府，達成臺灣獨立的目標。」請參見「呂秀蓮調查筆錄」（1980年1月23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⁶³ 例如林義雄供述：「高雄人權集會既然受到政府及治安單位的制止，我們就要『以暴對暴，以力對力』，務使我們的活動能實行。」請參見「林義雄調查筆錄」（1980年1月22日），〈美麗島事件〉，《國家安全局檔案》，檔號：A803000000A/0068/C2801/0001/02/001。

⁶⁴ 〈蔣經國日記〉，1978年6月28日、7月9日、7月10日、7月14日、8月21日，收入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頁172-177。

⁶⁵ 「安和計畫草案」，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2。

⁶⁶ 國民黨政權（本質：外來、外省人為核心）似乎對形成外省人與本地臺灣人合作反抗國民黨的態勢有所忌諱，這在1960年代雷震組黨——自由中國事件也可窺端倪，幾乎只處理外省人，使參與該事件的本地臺灣人幾可倖免。美麗島事件處理方式還是同等思維（外省人跟臺灣人的政治案件必須分開處理），不在政治案件處理上形成兩者有合流、合作的印象。

的匪諜情節——統派「寄生黨外、壯大自己」，⁶⁷ 刻意不讓外省人和統派背景的美麗島人士捲入本案；幾乎所有曾被當局鎖定為涉共之左派核心人士（例如：陳映真、尉天驄、王津平、陳鼓應、王曉波、唐文標、蘇慶黎、蔣勳、曾健民、徐慎恕、齊益壽），⁶⁸ 都沒有成為最終劇本定稿的「附匪」角色，且大致可以在本案全身而退，少數仍繫案者則被淡化其涉共及統派色彩（例如：王拓、陳忠信）。因此，最後僅運用到洪誌良一案，以黃信介為樞紐，形塑一套公式下的叛亂構陷脈絡：「黃信介→洪誌良→鰻苗→中共→利潤→洪誌良→黃信介→黨外→美麗島雜誌社→臺獨」，⁶⁹ 利用偵訊技巧，將黨外、美麗島人士、雜誌社、臺獨與中共勉強搭上線，使「黃信介 + 中共」成為公式——外力因素的萬用參數。

顯而易見地，叛亂公式之運行必然不是施行科學公式法則，難以用理性運算、思考。也正因為「它」不是數學或物理公式，所以才能顛覆邏輯、才有人為操作的空間，才會讓水火難容的海外臺獨與中共、獨統兩方統編在當局的構陷脈絡中，齊心共謀美麗島叛亂，甚或可以依照國民黨當局的政治盤算而任意選擇劇本A或B，縱使是採行更無邏輯的方案也要「橫柴入灶」（例如本案選擇更牽強的黃信介——洪誌良案）。叛亂公式先天上的荒謬性，讓當局自圓其說的證據或論理要求可降至極低，所以，一方面調查局自矜透過極有限之「與匪勾搭」的證據，突破案情關鍵，⁷⁰ 但另一方面，國安局事後卻又檢討因偵訊缺乏統合而導致

⁶⁷ 據1980年1月的偵訊綜合報告：「統一派：既聯合又鬥爭——以尉天驄、陳永善、唐文標等人為首，主張『中共統一臺灣』，由蘇慶黎、王拓出面參與『美麗島』之活動，採取『寄生黨外、壯大自己』，俟『臺獨派』顛覆政府後，再從『臺獨』分子手中，奪取政權。」「美麗島雜誌策動高雄事件偵訊綜合報告」，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09。

⁶⁸ 「一二一〇專案十日來（元月十二日至廿三日）偵訊內容綜合要點簽核」，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175。

⁶⁹ 陳佳宏，〈美麗島偵訊期間之「叛亂」建構——以軍法被告為中心〉，收入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執行編輯，《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35-38。

⁷⁰ 此相當有限之「與匪勾搭」的證據，在事後被當局奉為「使美麗島及團分子不法活動之陰謀，真相大白，奠定全案法辦之基礎」。「『一二一〇（安和）專案』行動組檢討報告」，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32-433。

「軍法審理證據上，顯得基礎薄弱。」⁷¹ 兩方相左的「自我感覺」皆非叛亂驅動程式，因為，任憑再荒誕離奇的構陷脈絡都不會造成公式無法運行，也不影響公式結論；反之，若公式運行窒礙，則就非因理性驗證使然，而是出現劇本之外的變數，衍生意外插曲，讓構陷脈絡如同程式錯誤般陷入難以回應的遲滯，甚至產生與原先公式法則矛盾的劇情與人物設定。

1980年2月28日倏忽襲來林宅血案之意外，⁷² 令各界震驚，橫生變數也讓去年以來順利運行中的美麗島叛亂公式難以為繼。如此慘絕人寰的悲劇，光天化日竟在嚴密監控的眼皮下發生，國民黨當局實難辭其咎，事後也自承為「首項缺點」、「使政府威信遭受損失」；⁷³ 固然因黨國媒體結構⁷⁴ 而難以呈現「民意」直接究責當局的聲浪，但炸裂的各式輿情，已足以讓當局陷入被動，無法照著原先的公式運行。畢竟，死者為大，人倫之常，即使是威權體制下的臺灣社會，悲戚至極所蘊生的溫情訴求依舊是撥動人心趨向的強效觸媒，各界無論先前對美麗島事件的立場如何，至此大都紛紛一掬同情之淚。從去年高雄衝突事件以來，當局藉著構陷鋪陳與伏筆，連載戲劇化橋段，使一些盲信的民眾陷入對美麗島人士的激情撻伐氛圍中，甚者立血書誓願，以生命相搏，直要去之而後快（判處死刑可也），⁷⁵ 如今，期待化為真實且更加血腥，先前喊打喊殺者不知作何感

⁷¹ 「一二一〇專案工作檢討會議擬具工作檢討及處理意見」，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22。

⁷² 持黨外立場者一般推測，謀殺動機係國民黨鷹派本欲藉美麗島事件下重手，但因國際壓力，蔣經國讓步，鷹派心有不甘，遂在二二八日找家屬開刀，對臺灣人而言，充滿強烈警告意味，請參見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 民主的浪潮》（臺北：衛城出版，2014年），頁196。

⁷³ 警總治安組在安全措施上一再強調必須「對嫌犯家屬加強監護，防止人以苦肉計栽贓嫁禍」，顯然有自覺此刻美麗島相關人士遭遇不測，勢將造成當局威信的重大傷害，故事後乃將林宅血案之不幸，列為成效檢討中的首項缺點，請參見「一二一〇（安和）專案結案檢討」，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97。

⁷⁴ 威權政治體制下的臺灣媒體環境，國民黨政府採取介於「鎮壓（repression）」與「籠絡（co-optation）」之間的「收編（incorporated）」模式，使媒體對當局產生微妙輔助的依賴機制，形成「黨國媒體控制」結構；Chin-Chuan Lee, “Sparkl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 (January 1983), pp. 1-39.

⁷⁵ 〈聽！全同同胞心聲 大專院校師生工商職業團體及教會 分別集會聲明指摘美麗島製造事端 要求依法懲處滋事份子絕不能寬縱〉，《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12月13日，版3。

想？至少代表蔣經國前來善後的國民黨副秘書長關中是「表情悲痛，哽咽幾不能言」，⁷⁶ 可見血案對其情緒打擊之重；惟在悲憐家屬情境的同時，恐怕亦帶有對當局處境的憂思。

原本透過高雄衝突後的「激情」鋪陳，將美麗島人士推向罪惡淵藪，令叛亂公式得以順暢運行，然林宅血案後反饋的「溫情」，沖淡公式裡叛亂犯被構陷的凶惡性，不免減損罪惡強度；林義雄在飽嚙血案苦果後形象乃結構性翻轉，媒體一改先前之無盡詆毀和醜化，竟「專訪」他這位叛亂犯，還形容林骨子裡「有一種傲然的神態」，並以小說化的抒情筆調，描述林家父慈女孝的感人情節，⁷⁷ 令人很難想像前不久的同一批寫手，才用同樣手法挑動著各界對美麗島人士的仇恨，如今180度翻轉，等同「自我打臉」般的邏輯錯亂；黨國媒體控制機制下的媒體輸出，自為國民黨當局所默許，⁷⁸ 證明同時間的當局也陷入類似處境的措手不及，如同把公式寫成程式（演算法）時發生錯誤，讓被叛亂公式一路追剿的美麗島人士有所轉圜。

叛亂公式之運行，並非奠基於理性邏輯，若訴諸於群眾人性面，常以理盲濫情的姿態顯現，因此，它可以寄生在吞噬美麗島人士的激情（仇恨心）鋪陳裡滋生蔓開，也同樣能在反向的溫情（憐憫心）蔓延中強力運轉，只是結果卻反其道而行、拉拔深埋構陷泥沼中的美麗島人士；這好比公式運行——程式演算上出現意外輸出的「語意錯誤」（semantic error），⁷⁹ 即是血案後的美麗島人士在公式中的結論——叛亂犯——可以不變，但卻是人格堅毅、父慈子孝、有為有守等具備美德、可資典範的叛亂犯；如此錯亂結果，不僅落入程式設計中不易捕捉處理的語意錯誤，也會動搖叛亂公式（叛亂 = 共匪 + 臺獨）的權威性。

⁷⁶ 〈總統關注林宅慘案 指示立即保釋林義雄處理善後 懸賞五十萬元並全力緝兇破案 保護涉及高雄事件各被告家屬〉，《中國時報》，臺北，1980年2月29日，版3。

⁷⁷ 〈父女會 病榻前 敘親情〉，《中國時報》，臺北，1980年3月1日，版3。

⁷⁸ 以「平面媒體」而言，具「黨報」性質之《中央日報》的角色自不待言，「兩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雖名為民營，但其負責人為具外省菁英身分且長年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的王惕吾和余紀忠，二人同為黨國統治權力機制的核心成員，也註定兩大報須仰仗黨國鼻息，被收編為國民黨政府的喉舌，實趨近黨媒或官媒的本質。

⁷⁹ 在程式設計中，相對於「語法錯誤」（Syntax Error）會導致整個程式無法運行，「語意錯誤」（Semantic Error）雖也會運行出錯，但還不至於崩潰，也可以繼續運行，只是可能會產生意外的輸出或與預期不符的運行結果。

當局未必不欲排除此程式錯誤，故在緝凶方向上多次導引至黨外美麗島陣營之窩裡反（第二節的伏筆之一）；揭穿叛亂一方「自導自演」的詭計，或是援引公式中的外力項，將海外臺獨和中共皆列為幕後黑手，都在企圖圓此叛亂公式的設定；甚至不惜甘冒觸犯美國人權界線，指向具美國公民身分的家博（J. Bruce Jacobs）成為「理想的兇手」，⁸⁰ 流露公式中隱藏的「美帝」⁸¹ 國際因素；惟隨著追兇緝捕無門，種種血案謠傳無法平息，對林家老小的溫情外溢至其他美麗島人士的政治效應形成，讓叛亂公式愈益難以重回常軌，平添劇本之外的更多變數，包括接踵而來的美麗島軍法大審之掌控。

肆、照稿與「脫稿」⁸² 之間

美麗島事件進展到軍法大審時，其劇本主線已近尾聲，期間雖有林宅血案的變數，但主要8名軍法被告的偵訊均在檯面下順利完成，也取得符合國民黨當局構陷脈絡的期待供述；在當局的劇本盤算裡，公開審判等於是公開展示構陷成果，讓美麗島人士一一上臺，「照稿」行禮如儀，公開懺悔、認罪、求饒以求生；⁸³ 如意算盤是可徹底讓反對力量永遠抬不起頭而土崩瓦解。⁸⁴

誠然，美麗島被告基於性格、臨場應變能力、人性自保本能等各種因素而在法庭有不同的樣態，在長期被隔離偵訊的身心折磨下，若順著國民黨當局期待、照稿演出亦為人情之常。除了認錯、道歉這些構陷劇本上必備的「問候語」之

⁸⁰ 陳佳宏，〈「美麗島林宅血案」輿論情勢之分析——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2018年12月），頁114-117。

⁸¹ 蔣經國日記中多次透露蔣對美國介入施壓臺灣人權事件的不滿，多次痛斥為「美帝」，惟大多僅止於檯面下；美麗島偵訊紀錄中的美國因素亦被淡化，也未成為當局構陷美麗島人士的論罪依據，故不明列為叛亂公式的基本組成項目。

⁸² 相對於按照當局構陷劇本編排的「照稿」，本文的「脫稿」意指美麗島被告論述有別於偵訊紀錄的法庭言論。

⁸³ 姚嘉文，《風吹美麗島》（臺北：前衛出版社，2008年），頁72。

⁸⁴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與美麗島大審》，頁230。

外，前述叛亂公式所演算的「罪行」，包括「臺獨」、「暴力奪權」、「海外陰謀」、「共產黨」等都是為美麗島被告定罪的依歸，無疑是法庭上各方攻防的焦點，也是大審前置作業——偵訊紀錄的構陷要點。檯面下偵訊工作之平順，產生這些形同「認罪稿」的調查筆錄，的確會讓當局樂觀認定被告已然認罪；檢察官亦據此腳本起訴。

在安排軍法被告上審判庭前，國民黨當局曾盤算是否先行對外播放他們的偵訊影帶廣為宣傳，經評估建議，黃信介、林弘宣、張俊宏等3人可播放（黃可摘要、林可全程、張可播但效果不大），呂秀蓮（精神欠佳，要求政治處理，故不宜）、陳菊、施明德、姚嘉文（施、姚2人同在自塑英雄形象，故不宜）等4人不宜，林義雄部分則未置可否；⁸⁵ 後來固然全部皆未播映，惟被評估為最適宜播放供述的黃信介、林弘宣2人，應可被預期最是可以照稿，所以便被安排為率先上審判庭者。⁸⁶ 1980年3月18日大審首日，審判長以防止串證為由，排除美麗島被告們的共同出庭；⁸⁷ 這讓首位登場的黃信介在資訊未明的情況下，自承從事臺獨活動實在是無知卑鄙，心裏很慚愧，⁸⁸ 並以「我犯了大錯」歸結其行為；⁸⁹ 平面媒體隔日即以頭版處理，大書黃信介悔錯，以及對蔣總統仁慈寬大的讚賞、歌頌政府、警總，詆毀臺獨，末了聲明如果有機會將不再搞臺獨。⁹⁰ 開局完全符合劇本走向，益使當局自信其他人亦然，全程皆會持續按照劇本編排照稿演出，遂繼

⁸⁵ 「一二一〇專案嫌犯偵訊錄影審查要報」，收入林本原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六）軍法審判》，頁354-358

⁸⁶ 8名軍法被告按照審訊順序分別為黃信介、林弘宣、呂秀蓮、施明德、姚嘉文、陳菊、張俊宏、林義雄。依據調查局初擬意見應移送軍法審理者原本有16人，除前述8名外，尚有張富忠、陳忠信、邱茂男、范政祐、邱垂貞、蔡有全、王拓、蘇慶黎等八人。「一二一〇專案偵訊綜合報告節要」，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00-201。

⁸⁷ 〈隔離調查證據 一再引起爭議防止被告串證 有時有其必要〉，《聯合報》，臺北，1980年3月20日，版3。

⁸⁸ 〈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頁143。

⁸⁹ 〈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143。

⁹⁰ 〈黃信介在庭中陳述政治見解 確信臺獨不是辦法 懺悔過去錯誤及造成政治污染 面對高雄暴力證件表示太慘了〉，《聯合報》，臺北，1980年3月19日，版1。

續放手讓媒體可全文逐字稿刊登，才使得脫稿產生「意義」。⁹¹

在臺獨罪行上，黃信介一如上述是最照稿、最配合當局構陷脈絡的被告；林弘宣照稿、未撇清與臺獨的關係，不過他脫稿定義臺獨係為長老教會歷來的自決主張，並闡明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現在的領土在臺灣。⁹² 施明德是被告中最勇於表達臺獨主張，照稿而毫無遮掩其臺獨心志，但同時也在庭上脫稿，暢談其「中華民國式的臺灣獨立」。⁹³ 姚嘉文用比較迂迴的方式，不完全照稿而以學理論述臺灣的民主政治改革並非變更國體，因此不是叛國思想。陳菊照稿供認主張臺獨，並曾與海外臺獨聯繫，也脫稿闡釋「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的看法。⁹⁴ 林義雄主張臺灣住民的自決權卻否認此為臺獨意識，基本調性為脫稿。⁹⁵ 有別於前述數人在臺獨論題上的論述大多是脫稿偷渡臺獨意涵，或將臺獨與自決權、中華民國獨立連結在一塊，呂秀蓮在臺獨上的脫稿，目的多在於否認偵訊筆錄自述的臺獨連結，僅承認其宣揚的是「臺灣本土意識」；⁹⁶ 與呂類似，

⁹¹ 如果是無全程公開所有審訊論辯訊息的審判庭，脫稿將是毫無意義，因為被封閉的資訊環境，即使脫稿也無從傳播、無人知曉。

⁹² 林弘宣：「中華民國三十年一直都是獨立的國家，……中華民國做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它現在的領土是在臺灣。」〈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171。

⁹³ 施明德：「臺灣事實上已經獨立，是在國際上取得獨立主權的國家，在臺灣海峽的一方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方有中華民國，在法律上臺灣已經是獨立的……在五月份我們發起重新加入聯合國，以中華民國名義而非臺灣名義，在法律上用中華民國，在私下通稱臺灣，分界非常清楚，臺灣獨立也就是中華民國獨立。」請參見〈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188-189。

⁹⁴ 陳菊：「被告一直堅持臺灣的未來一定要由一千七百萬來決定。所以被告不願被認為主張臺獨就是要臺灣人的獨立，而是要臺灣國際地位的獨立。這點被告在國外和中國問題專家討論時，即同意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看法，但是被告也不認為我所主張的臺獨就是要把在臺灣的外省人摒棄於被關懷之列。」請參見〈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245-246。

⁹⁵ 林義雄：「臺灣的前途應由居住在臺灣的一千七百萬多萬人一包括本省人及外省人一來共同決定。那是根據我所信仰的民主理想當然的結論，這絕不是什麼臺獨意識，一千七百萬人也可能共同決定馬上反攻大陸。」請參見〈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253。

⁹⁶ 呂秀蓮：「我從來未宣揚『臺獨』，只是宣揚過『臺灣本土意識』。……我基本上主張在臺灣的一千八百萬人應有『知』的權利和言論自由，但我從未講過臺灣獨立。」請參見〈審訊記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175。

張俊宏亦是以脫稿方式切割臺獨。⁹⁷

「暴力奪權」幾乎貫穿整個美麗島構陷脈絡的罪行主軸，因此，審訊焦點著重在「暴力」、「奪權計畫」、「意圖顛覆政府」等事端。反對運動需要大眾支持，才能夠取得正當性並獲得外來援助，但任何運動只要採取暴力便不免喪失信譽，甚至導致公眾的敵意。⁹⁸ 因此，當國民黨當局企圖以暴力控訴摧毀美麗島被告的道德正當性時，「反對暴力」便成為被告們構築共同防禦圈的庭上共識，惟主張「暴力邊緣」是否為暴力？姚嘉文對此概念以學理論辨，謂「循法律邊緣推進，實行暴力邊緣」之說，卻不認為這是在施行暴力，⁹⁹ 因此，順此邏輯，即使施明德承認其採取暴力邊緣策略，也非贊同採取實際上的暴力行為。整體而言，當局的構陷劇本在於將暴力邊緣等同暴力，故只要美麗島被告照稿承認有此「邊緣」想法，縱使脫稿一再闡明與暴力無涉等云云也無濟於事。

事實上，暴力與權力常處在對立面，暴力的產生，背後往往有其權力爭奪的軌跡；¹⁰⁰ 然則，在「奪權」部分，無人願意照稿承認有這份計畫。¹⁰¹ 只不過，國民黨當局對異議人士的猜忌總是「寧枉毋縱」，否則不會有這麼多白色恐怖政治迫害的存在，因此在「意圖顛覆政府」部分乃成為另一入人於罪的要項。唯獨只有施明德照稿重申要顛覆政府，且辦雜誌社的目的即在奪取政權，但前提是「合法」，他並脫稿舉例民主選制下的合法政權變動為證：「選舉一次就顛覆一次」；可是，這些基本的民主理念卻被主流媒體當成驚世駭俗的脫罪詭辯，¹⁰² 紛

⁹⁷ 張俊宏，〈審訊紀錄〉，收入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頁235。

⁹⁸ 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傑克·杜瓦（Jack DuVall）著，陳信宏譯，《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臺北：究竟出版公司，2003年），頁640。

⁹⁹ 姚嘉文的庭上的學理論辯表現，贏得旁聽席海內外記者之一致「封贈」，咸認他是本案8名被告中，「最挑剔難纏的被告」，請參見〈被告深諳法律 答問自不相同 中外記者一致認為 姚嘉文真的很難纏〉，《中國時報》，臺北，1980年3月22日，版2。

¹⁰⁰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1970), p. 56.

¹⁰¹ 根據蔡有全的實際參與經驗，美麗島的行動「沒有籌備會，也沒有方向，什麼都沒有」，他還認為：「高雄事件發生那天如果是革命的話，只是一場『革命馬戲團』的演出而已。」參見陳儀深訪問，周維朋紀錄，〈蔡有全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十二期：美麗島事件專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頁164。

¹⁰² 據旁聽的沈君山之觀察：「施明德最從容，可能是自知生機有限，就聽天由命了。也是筆挺站著，但連參考紙片也不帶，從合法顛覆政府到民眾決定自己命運的基本權利，侃侃而言。

紛對施下了「妄稱」、「竟稱」、「狂言」等標題註解。施明德照稿自承為「總指揮」，對意圖犯行大部分都坦承不諱，頗有要攬下美麗島叛亂罪責的膽識，作風在被告中獨樹一幟。¹⁰³

美麗島被告之海外陰謀的連結主要有美國、日本、中國三地。中國係黃信介牽涉共產黨部分，因黃與涉共人士在生意上的往來而牽扯中共高層允諾「臺灣自治區」主席一職，其照稿內容過於匪夷所思，且是具致命性的叛亂罪行，故全程大致能配合劇本步調的黃信介對此也要脫稿全盤否認；至於其他被告，只要能重申反對中共統治臺灣，即便照稿也不違背初衷本意，可謂「反共」是無論照稿或脫稿都是最契合各方政治利益的宣示。¹⁰⁴ 日本一地，僅有臺獨聯盟黃昭堂與陳菊往來一事，陳均照稿坦承不諱。其他指涉的海外團體或人物皆位居於美國，計有組織系統最完整的臺獨聯盟（張燦鑒、張金策）、宜蘭黨外要角郭雨新在美維持其政治能量的臺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從事海內外電話語音宣傳的臺灣之音（張富雄夫婦）、彭明敏的臺美協會、陳婉真的潮流，以及協志會、臺灣同鄉會等，尚包括一些臺灣人權組織，甚至還把在美麗島事件後才聯合海外臺獨團體組成的臺灣建國聯合陣線¹⁰⁵ 都一併視為幕後操縱美麗島被告的海外陰謀策劃；有過美國經驗的陳菊、呂秀蓮、林弘宣、姚嘉文、林義雄等人均遭牽連，他們也都有條件照稿敘述與海外的聯繫，但亦脫稿否認涉入共謀叛亂。

今天看來，也不過是主權在民、選舉出政權等，陳義不能算高，更無革命氣息的主張，但在當時已經是很突出。而且施明德不亢不卑，引經據典，理路清楚，自成一體，確實令人動容。」請參見沈君山，〈施明德和魏京生〉，收入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總策劃，《永遠的主題：施明德與魏京生對談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年），頁VI。

¹⁰³ 3月20日施明德庭訊時，即被指態度傲慢不佳。由於施說話太快，且於陳述理由時態度相當狂傲，曾經引起其辯護律師的不安，數度起立發言，要求他注意講話的速度及對審判長的禮貌，請參見〈涉嫌叛亂案 施明德受審 被告態度狂傲 承認是暴力事件總指揮 自稱同意臺獨 從事顛覆另有一套狡辯〉，《中國時報》，1980年3月21日，版2。

¹⁰⁴ 根據前述法制面的構陷脈絡，「共匪」被視為臺灣萬惡的淵藪，故不管持任何立場者，只要能高舉反共大旗，都是站在正義、正確的一方，任誰都難以質疑反共的正當性；概言之，即使聊備一格，「宣示反共」依然是叛亂被告脫罪的最佳辯詞，以及是否能得到當局寬赦的必備誓詞。

¹⁰⁵ 〈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台灣青年》，第232號（1980年2月5日），頁18；〈台灣建國聯合陣線成立宣言〉，《台獨》，第94期（1979年12月28日），頁2。

站在國民黨當局構陷立場，自然是期待全體全盤照稿，完美收官，確立勝局，但亦曾研判被翻供的可能性不小，¹⁰⁶ 因此「一二一〇專案法辦組」已事先預擬劇本之外的狀況而反復演練，包括「被告於審判期日可能製造之狀況」、「各種狀況暨處置腹案」、「訊問要點」等。¹⁰⁷ 對美麗島被告來說，在照稿與脫稿之間的考量實為複雜，無容諱言，有幾位較為人性面，是以脫罪與否為取捨；全盤照稿就是依照當局的構陷脈絡以行，易言之，即是全部認罪；在血案效應發酵下，認罪後道歉，或許有機會因溫情悲憫而稍得寬免，但是去承認一個戒嚴時期惡法下被構陷的「罪」，¹⁰⁸ 任誰都難以甘心屈從；因此，有幾位被告便不認「罪」，並非全然否定當局所構陷的言行，而是不認同美麗島的這些作為係放諸四海皆準的罪，遂固然可照稿承認某些構陷言行，可是透過理性論辯，依然欲證明其之正當性以彰顯其志，縱使可能加重其刑亦在所不惜。展現更無畏精神的被告則是，脫稿闡明這些言行的道德正當性與普世人權價值，包括人民自決權、民主改革（中央民代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開放黨禁報禁……）、爭取臺灣國際地位（加入聯合國），以及臺灣主體性等論述；基本上均非新創主張，也不是被告的臨時發想，多僅是照稿去宣揚黨外陣營長期以來所追求的共同價值與理念罷了；¹⁰⁹ 只不過，在黨外時空與軍審法庭上發抒的最大差別，在於能透過戒嚴時期這一瞬「傳道」良機，讓這些價值理念（當局認定的「罪」）能「『罪』大善極」，全程逐字傳播、擴散，使加成效應無所不至，美麗島被告付出這些代價或許才算值得。

¹⁰⁶ 警備總部軍法處之研判：「本專案中之被告心態及情狀均難掌握，且目前供詞閃爍、情緒不穩，起訴後可能均將翻供……」請參見「警總軍法處審理一二一〇專案計畫協調會紀錄」，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22。

¹⁰⁷ 「一二一〇（安和）專案結案檢討」，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70-471。

¹⁰⁸ 本段落加引號的「罪」係指「非普世價值的罪」，類似良心犯的「罪」，是本文國民黨當局構陷下的「罪」，與文明社會普遍認知的罪大相逕庭，故以引號作為區隔。

¹⁰⁹ 可見諸1978年7月31日〈臺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1978年12月25日〈黨外人士國是聲明〉、1979年4月12日〈黨外國是聲明〉；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150-151、166-169、170-171。

威權戒嚴時期勇於從事反對運動的人士，想必或多或少都有必須付出某些代價的覺悟，可是，即使懷抱熱血、投身美麗島陣營，在高雄衝突事件後身陷囹圄，承載著臺灣人數百年來的血淚枷鎖，暗夜迴旋間可曾悔不當初？柏拉圖曾將人類靈魂層次分為「欲望」、「理性」和「氣魄」（thymos）三個層次；生而為人，並非僅止於滿足欲望與理性面，尚具懷抱希求他人承認自己的價值、自我的尊嚴（self-esteem），即是來自靈魂的氣魄層面；¹¹⁰ 可以超越基本欲望，未必符合理性，可能只為了得到虛無飄渺的尊嚴，展現氣魄的人願意接受屈辱、踐踏、污蔑，甚至是生命的威脅；若援引此柏拉圖之闡釋，依據前述美麗島被告在照稿與脫稿之間的曲折轉圜可整理分析如表2：

表2、美麗島被告之選擇對應表

選 擇	人類靈魂層次		
照 稿	一	自保本能	認罪→求惡法寬赦
	二	理性論辯	攬「罪」→惡法非法、非罪
	三	氣魄尊嚴	堅持理念→認「罪」不認錯
脫 稿	一	自保本能	脫罪→拒絕羅織
	二	理性論辯	深化「罪」行→「罪」大善極
	三	氣魄尊嚴	闡揚理念→傳道者、殉道者

說明：以引號標示的「罪」，係指戒嚴體制下相關法條中認定的叛亂罪，但在民主化後這些「罪」不惟無罪，有些反而漸漸成為主流價值，例如諸般民主自由人權等進步價值、臺灣主體性思維等。

於這場美麗島事件的最後戰役——軍法大審中，在國民黨當局鋪陳多時、將叛亂公式化進逼之際，務要美麗島被告全盤照稿、俯首認罪；然而，觀察美麗島軍法被告的選擇卻非全然一致，而是選擇性的照稿與脫稿，即使是照稿也不完全是照劇本演出，亦非只有人性自保本能下的認罪與脫罪，反而在照稿中有其劇本

¹¹⁰ 參考法蘭西斯·福山之闡釋。請參見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序頁8。

之外的脫稿效果，間或起身與當局展開理性論辯，乃至挺身「傳道」為民主理念、人權信仰價值而把人類靈魂昇華至最高層次，甚者不惜「殉道」，也非要展現臺灣人當家作主、不願為奴的心志；正如同黑格爾所言：「想被認為有尊嚴的這種欲望，驅使歷史起點上的人奔向為聲名而死的血腥之戰。此戰的結果，使人類社會分化為願冒生命危險的主人階級和屈服於死亡本能恐懼的奴隸階級。」¹¹¹

其實，毋須對美麗島人士在奔向黑格爾所稱「血腥之戰」時的選擇，評價其高下，畢竟人終究是人，人不會變神，更不該神化，任何時機當下的選擇都是為自己負責即可，他人無庸置喙，也不要作道德審判或情緒勒索。倘使以人性角度切入被告之證詞和陳述，便會對其在自保本能與性靈昇華間之糾結多些同情與理解；可如果懷抱著想實現更偉大壯麗的臺灣人夢想時，則何妨在照稿與脫稿之間多存留一些臺灣人的氣魄尊嚴。

伍、結論

根據國民黨當局在美麗島事件後所採行之連串構陷之脈絡，可以判斷此係黨國控制結構下，一場精心策劃的戲碼；在時序上，或許是在事件後才讓陷阱浮出，但這個按照長年壓迫白色恐怖政治犯累積之羅織經驗（叛亂劇本）下所鋪設的既成陷阱，早就是一個「常態性的構陷脈絡」，可謂隨時存在的陷阱而待人入甕；所以，如果依此界定，將美麗島高雄衝突事件界定為當局精心設計的陷阱，其實並不為過，而美麗島人士因此落入陷阱也不會令人意外，若有驚異點，那應該就是當局明擺著的陷阱在前，整個威權戒嚴時期卻還有這麼多人願意前仆後繼，把陷阱鋪平，最終鋪成臺灣的民主坦途。

與其他眾多政治案件之構陷脈絡相較，美麗島事件同樣有其事先編排好的叛亂劇本與公式化之叛亂情節，特別之處在於多了一些引導輿情的戲劇化鋪陳與伏

¹¹¹ 參考法蘭西斯·福山之闡釋；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序頁9。

筆，以及國民黨當局敢於全程公開展示構陷成果。¹¹² 蔣經國對事件決策的諱莫如深，讓各界塑造「民情」以聲討美麗島人士，成為支撐其鎮壓決斷的正當性來源，然而，在遮掩其鎮壓決策的同時，卻又在預判可能被翻供的情況下，¹¹³ 還肯向海內外傳媒開放軍審全程，如此「硬碰硬」的態勢，若非欲藉此展示統治自信，就是早做好準備，自認可有效應對美麗島陣營之各式反撲；¹¹⁴ 據稱蔣經國曾對此下指導棋：「要防他們把法庭作為反政府的宣傳場所，防他們全部翻供，不容他們在法庭詭詞狡辯，對政府造成不利。」¹¹⁵ 當局的確也事先協調各單位先期擬定種種善後應變措施（十八套劇本），¹¹⁶ 以便使這場美麗島大戲能繼續成為當局收聚民心、鞏固統權基礎的樣板；因此，即便是「劇本之外」的劇情反轉，也不會脫出在當局的「劇本設想範疇之內」。然而，無論劇本內外，終究有其「效期」，隨著臺灣內外國際情勢的改變，當局當年所掌控的「劇本（包括當年的『劇本之外』）」，也一再反轉而超出當局當年所可以設想的「劇本之外」的所有發展——隨著時局演變，美麗島事件與審判結果逐漸成為被壓迫方（美麗島陣營、黨外到民進黨）的政治與歷史資產，亦為壓迫者（國民黨）眾多政治案件裡難以抹滅的污點之一。

¹¹² 美麗島軍法大審之公開並非特例，1960年雷震案軍審亦曾公開，不過後者審理程序草率，前後時間不到6小時，因此，歷時9天且容許被告作「最後陳述」，並可讓媒體完整刊載的美麗島軍審算是破天荒，請參見吳乃德，〈美麗島的資產〉，收入黃煌雄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新北：遠足文化公司，2017年），頁446。

¹¹³ 1980年2月1日警備總部軍法處之研判：「本專案中之被告心態及情狀均難掌握，且目前供詞閃爍、情緒不穩，起訴後可能均將翻供……」請參見「警總軍法處審理一二一〇專案計畫協調會紀錄」，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22。

¹¹⁴ 警備總司令裁示：「審理時對被告翻供等各種情況，應先期擬妥應對措施。」請參見「警總軍法處審理一二一〇專案計畫協調會紀錄」，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25。

¹¹⁵ 「一二一〇專案工作檢討會議擬具工作檢討及處理意見」，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22。

¹¹⁶ 警備總部政戰部建議：「本案對社會影響甚鉅，故對公眾教育很重要，應區分為案發起訴至公開審理、公開審理至宣判，及宣判後等三時期，作一通盤新聞宣導計畫，以使公眾瞭解法律程序、案情及政府立場，產生正確認識。」請參見「警總軍法處審理一二一〇專案計畫協調會紀錄」，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225。

畢竟，幾位美麗島軍法被告之傳道式宣揚民主化和臺灣主體性理念，其政治效應和歷史定位之無遠弗屆，任誰都無法在當下準確評估，直讓事前做好沙盤推演的國民黨當局在事後檢討時扼腕：「未能有效防止案犯在審理期間之公開政治污染……對廣大民眾之心理影響甚鉅。」¹¹⁷顯然擔心劇本之外的後續發展會對當局不利，反將有利於黨外美麗島陣營的發展。同樣地，一些評論者談及該事件時，常推崇其為臺灣史重大轉折之關鍵，對民眾產生啟蒙，深化臺灣民主進程的動力，¹¹⁸或謂事件的「情感動員」（emotional mobilization）、道德憤怒，以及普遍性的政治關懷，係臺灣民主運動在挫敗後能迅速崛起的基礎之一，是「政黨認同組合」（party alignment）的分水嶺，創造了對「黨外」（以及後來的民進黨）的長期支持群體。¹¹⁹然而，下此重大評述者亦坦言「由於缺乏完整的資訊，我們如今只能想像這些事件，……我們只有零星的回憶。」不免令人省思，這些對美麗島事件的歷史評價，是否落入「想當然耳」的歷史詮釋陷阱中？

觀察美麗島事件的後續效應是否發酵而撼動黨國統治結構？或許可從之後的幾場選舉（大型民意調查）結果，「科學」地檢視民眾的政治意向。誠然，受難者家屬與辯護律師群在恢復選舉後的1980年、1981年、1983年等3次較近選舉有所斬獲，不過，國民黨之得票率始終維持在六至七成的高檔，在1983年臺北市還締造7位提名者全上的勝績（當年國民黨以7 UP自喜），且直至解嚴後的1989年立委選舉，國民黨得票率依舊能達到59.7%的壓倒性優勢，¹²⁰似乎未見事件後的民意有背棄國民黨的趨勢或澈底翻轉臺灣的政治板塊。（即使是民主化後的歷次

¹¹⁷ 國民黨當局事後檢討承認：「此次公開審訊期間，案犯之狡辯、翻供，以『刑求』、『疲勞審訊』來醜化治安單位，又以各種似是而非、歪曲事實、混淆視聽的怪調調言，以期為其脫罪，對廣大民眾之心理影響甚鉅。」請參見「一二一〇專案工作檢討會議擬具工作檢討及處理意見」，收入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頁422。

¹¹⁸ 陳佳宏，〈美麗島事件對大眾民主思潮的影響〉，《臺灣學通訊》，第36期（2010年1月），頁13。

¹¹⁹ 吳乃德，〈美麗島的資產〉，收入黃煌雄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頁441。

¹²⁰ 中央選舉委員會，《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35年-76年》（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8年），頁106-107、171-172、226-227；林俊杰，〈國民黨政府與黨外運動之拉鋸——以美麗島事件為中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頁186-187。

選舉至今，國民黨依然具有強大的競爭實力）

整個臺灣威權戒嚴時期就是布滿重重構陷，任誰都能看透這是國民黨當局的陽謀，偏偏反對陣營——黨外美麗島人士仍然勇往直撲陷阱，以身示道，展現人類高貴的情操，雖然人性亦有晦暗面，他（她）們也曾怯懦過，但荊棘道旁的苟安臺灣人又有何資格苛責什麼？何況，徵諸前述「科學數據」，¹²¹ 美麗島事件後大部分的臺灣民眾還是習於站在國民黨（及其價值體系）那一邊，平庸地繼續成為構陷脈絡中的幫襯者；¹²² 平凡大眾願挺身為對抗威權當局而犧牲私利者幾希矣，縱然一些臺灣人對犧牲者、受難者不乏心生同情悲憫，但大多人的「情感動員」僅止於此而已。若說美麗島事件之連串效應真能廣泛地啟迪民心、播下民主種子、撼動臺灣政治結構等美談云云，那可能只是一種被期待的「歷史正確」；尚有待更謹慎的歷史論證。

¹²¹ 當然，選舉牽扯種種利害糾葛、人情是非，甚至國民黨當局過往選舉舞弊賄選醜聞不斷，都可能影響人的投票行為與選舉結果，然而，造物主既然賦予人自由意志，當選舉人投下選票的那一刻，即是代表自己的價值取向，「得票率」也是相對上較具參考價值的科學數據。

¹²² 借用鄂蘭「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概念詮釋：身處在威權時代的臺灣人應該不愚蠢，但如果喪失思考能力，就會產生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狀態，是引發災難和浩劫的元凶，比人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pp.287-288. 漢娜·鄂蘭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社，2013年），頁317。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國家安全局檔案》（新北，檔案管理局藏）
〈美麗島事件〉。
《國防部軍法局檔案》（新北，檔案管理局藏）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案〉。

二、史料彙編

- 何鳳嬌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五）逮捕與偵訊》。臺北：國史館；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
林本原編，《美麗島事件史料彙編（六）軍法審判》。臺北：國史館；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2022年。
周琇環、陳世宏主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二）組黨運動》。臺北：國史館，2000年。
新新聞周刊編輯部編，《美麗島十年風雲》。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三、年鑑、辭典

- 中央選舉委員會，《中華民國選舉統計提要：35年-76年》。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8年。

四、文集、回憶錄、訪談錄

- 王康陸文教基金會編印，《王康陸博士紀念文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年。
姚嘉文，《風吹美麗島》。臺北：前衛出版社，2008年。
高陽生，《美麗島事件》。臺北：駿馬文化事業社，1979年。
陳儀深主訪，《口述歷史第十二期：美麗島事件專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4冊。臺北：桂冠出版公司，1990年。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暴力與詩歌：高雄事件

- 與美麗大審》。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99年。
-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總策劃，《永遠的主題：施明德與魏京生對談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2年。
- 楊青矗口述原著，陳世宏訪問編註，《楊青矗與美麗島事件》。臺北：國史館，2007年。
- 歐素瑛、黃翔瑜、吳俊瑩執行編輯，《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1年。

五、雜誌、報紙

- 《中國時報》，臺北，1979-1980年
- 《台独》，美國，1979年。
- 《台灣青年》，東京，1980年。
- 《聯合報》，臺北，1979-1980年。

六、專書

- 呂秀蓮，《重審美麗島》。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傑克·杜瓦（Jack DuVall）著，陳信宏譯《非暴力抗爭：一種更強大的力量》。臺北：究竟出版公司，2003年。
- 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著，吳介民譯，《反動的修辭》。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法蘭西斯·福山之闡釋；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李永熾譯，《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 民主的浪潮》。臺北：衛城出版，2014年。
-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年。
- 黃煌雄編，《三代臺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新北：遠足文化公司，2017年。
-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20年。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社，2013年。
-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稻鄉出版社，2014年。

Arendt, Hannah.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1970.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

七、期刊論文

陳佳宏，〈美麗島事件與臺獨〉，《臺灣風物》，第54卷第2期（2004年6月）。

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勢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第14卷第1期（2007年3月）。

陳佳宏，〈美麗島事件對大眾民主思潮的影響〉，《臺灣學通訊》，第36期（2010年1月）。

陳佳宏，〈「美麗島林宅血案」之輿論情勢——以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為中心〉，《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1期（2018年12月）。

陳佳宏，〈從「美麗島軍法大審」看國民黨當局對黨外力量的壓制〉，《二十一世紀》，總第177期（2020年2月）。

Lee, Chin-Chuan. “Sparkling a Fire: The Press and the Ferment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aiwan.” *Journalism Monographs*, 138(January 1993).

八、學位論文

林俊杰，〈國民黨政府與黨外運動之拉鋸——以美麗島事件為中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年。

九、網路資料

〈評李明哲案 呂秀蓮：自白內容待驗證〉，收錄於「自由電子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81051>（2023/06/20點閱）。